

【课程与教学论】

正确认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回顾与启示

马 磊, 徐林祥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由于正确把握了语文教学的规律,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建构了“语文双基”的课程内容体系,强调了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主体性,为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当代语文教育界应从1963年大纲中获得启示,坚持“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统一,回归语言本位;坚持“语文知识”和“语文运用”的统一,重构课程内容;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统一,发挥师生双方的主体性。

关键词: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文道统一;双基教学;教学主体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8)03-0084-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2018.03.012

1963年5月,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纠正了“教育革命”的错误,遵循了语文课程教学的规律,为语文课程教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时期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奠定了宝贵的基础。本文拟对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作出历史回顾和反思,以期获得当代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启示。

一、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制定背景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是在深刻反思1958年“教育革命”错误,深入开展语文教育讨论和教学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吸取“教育革命”中教学秩序陷入混乱的沉痛教训,及时确立“教学为主”的原则,是1963年大纲制定的根本前提。195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日制学校应该“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1](P239-240)]。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确认了“教学为主”的原则^[1](P328)]。“教学为主”原则的确立,为恢复健康的教学风气提供了保障。

批评“教育革命”中语文教学“政治挂帅”的现象,

深入讨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使“文道统一”的观念成为广泛共识,是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制定的思想基础。1959年6月3日《文汇报》开辟“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专栏,“文道之争”拉开了帷幕。刘培坤首先撰文指出,“别科教学可以专取其‘道’而遗其‘文’;语文教学必须兼取其‘文’而且以取‘文’为前提”^[2](P211)]。刘松涛(署名洛寒)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3]。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指出语文“是人们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了掌握语文“工具”,“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与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学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2](P236-245)]。这个社论可以视为对“文道之争”的总结。“文道之争”是20世纪前期“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之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次革命”,“文道统一”观念的确立,标志着语文教育界正确把握了语文“工具”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为语文课程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反思“教育革命”中语文课程内容虚化的现象,积极建构语文课程内容,形成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

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2017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20世纪中小学语文课程修辞教学史论”(XKYCX17_001)

作者简介:马 磊(1982—),男,山东滕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语文教育研究;

徐林祥(1956—),男,江苏兴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语文教育研究。

训练的“双基教学”思想,是1963年大纲制定的学理基础。1961年夏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调研,形成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指导思想^[4](P433-436)。1961年,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吕型伟(署名殷伟)发表文章呼吁“严格加强基本训练”,“所谓基本训练,就是指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基本工具的基本技能的训练”^[2](P265-274)。随后,上海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知识的范畴、语文知识与语文训练的关系作出了探讨,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层次性和系统性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语文“八字宪法”^[2](P296-299,300-306)。1962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作了“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的讲话,提出语文基础知识就是“字、词、句、篇章,还有和文章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语法、修辞、逻辑等基础知识”,语文基本训练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掌握这些知识^[5]。稍后,吕叔湘指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并分别论述了讲解、练习、示范等教学方法的运用,与“双基教学”的讨论形成呼应^[6]。“双基教学”思想的确立,为语文课程内容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

纠正“教育革命”中政治运动式的语文教学方法,扎实开展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发挥师生双方的主体作用,是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制定的实践基础。例如,斯霞开展了小学“分散识字”教学实验,辽宁黑山北关学校开展了“集中识字”教学实验,北京景山学校开展了中小学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吕敬先开展了“小学生语文能力整体发展”教学实验。这些教学改革实验推动了语文课程教学策略的研究和讨论。

此外,一批教育史研究资料得以出版,为1963年大纲提供了历史参照。例如,孟宪承等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张志公著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等。这些书籍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综上,反思和纠正“教育革命”的错误是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制定的历史语境。深入开展语文教育讨论,正确认识语文课程的性质和任务,积极建构语文课程内容并探讨教学实施策略,扎实推进教学改革实验,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历史经验,是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制定的时代背景。

二、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思想要义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在语文课程目标上确立了“文道统一”的观念,在课程内容上建构了“双基教

学”的体系,在教学实施上重视了师生双方的主体作用,反映了当时语文教育界的思想高度。

(一)确立“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正式确认了语文是“基本工具”,确立了“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小学大纲和中学大纲都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①而且强调语文是“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大纲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作了界定:“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一界定,明确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作为语文课程的根本目标,抓住了语文课程的本质。关于文章内容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小学大纲指出:“在语文教学中,教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和掌握文章的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评析“文道之争”的基础上指出:“就一篇文章来说,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大纲力图避免教学中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割裂的现象,尤其强调了避免脱离语言文字而进行空洞的思想说教,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小学、中学大纲均单列“教学要求”部分,聚焦于识字写字、阅读、写作阐述课程的目标要求。“基本工具”的定性、“文道统一”的定位,反映着语文教学朝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趋势。

(二)建构“双基教学”的课程内容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突出了语文知识、语文训练的重要性,建构了语文课程基础知识、基本训练的体系。其鲜明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教学内容较为明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内容”部分阐述了识字写字、课文、练习、作文等;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内容”部分阐述了课文、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作文等。其次,教学序列较为清晰。小学、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提出,教学内容的安排,“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要线索,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体系”。并具体编排了各年级各学期的教学内容顺序。最后,教学方法注重语文实践。大纲强调了语文知识教学要与语言运用的实际结合起来。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阶段不要系统地教语法知识,要让学生从实际运用中领会必要的用词造句的规则。”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教学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要以练习为

主,知识力求简明扼要,切合实用。要同讲读教学、作文教学密切结合,避免孤立地讲授”。归结起来,对语文课程内容虚化的现象进行矫正,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系统作出初步的建构,并注重语文知识与运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实际运用中学习语文知识,成为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最重要特征。

(三)强调师生双方的主体作用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师的“严格要求”和学生的“积极主动”都作了强调。小学、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指出,教学中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学好语文“省力的办法是没有的”,应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刻苦学习”。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种种基本训练都要在多读多写的实践中反复进行。”关于讲读教学,“教师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地把课文讲解清楚,并且引导学生认真地积极地听讲和完成作业”。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还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提出课外读写“既要有统一的布置和一般的要求,又要适当地考虑到学生能力的差别和爱好的不同,尽可能做到切实具体,因材施教”。此外,大纲也对教师的素质作出了要求,提出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重视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勤学苦练”,又重视教师“启发”、学生“主动”,体现出对教师和学生双方主体作用辩证关系的认识,是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论述教学实施的重要特点。

总之,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思想要义体现为:一是确立了“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旨在将“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结合起来;二是建构“双基教学”的课程内容体系,旨在将“语文知识”与“语文运用”结合起来;三是重视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旨在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动”结合起来。

三、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历史意义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语文课程教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产生了启迪意义。

(一)指引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语文课程教学发展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发布之后,配套的语文教材当年秋季即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投入使用,语文教学进入了难得的春天。在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精神的指引下,语文教育界对语

文课程教学规律作出了新的可贵的探索。张志公1963年10月发表《说工具》,对如何在教学中遵循语文的“工具”特征、贯彻“文道统一”的观念,作出了深刻阐释,该文堪称对前一时“工具说”的升华^[7](P206-213)。语文教育界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教学策略展开了扎实的研究。例如,颜振遥对阅读方法的教学和阅读习惯的培养进行了实践研究,提出了“教会学生目览、口诵、手批、脑思的有效的读书方法”等^[2](P344-351);曾仲珊提出,语文作为一种工具“主要靠学生自己反复练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读写练习”是提高读写能力的主要途径^[2](P352-356);周学敏探讨了研究学情、改进讲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的方法^[8];朱作仁基于心理科学,对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的程序、测定指标进行了扎实的研究^[9]。一些学校逐渐总结了成功的教学经验,如上海育才中学提出了“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诀”^[1](P365)。196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教学工作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光明日报》随即发起关于启发式教学的讨论,教学研究呈现了热烈的氛围,促进了良好教学风气的形成。

(二)启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90年代,历次语文教学大纲修订都是以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为底本的,其思想要义得到了继承发扬。其一,语文“基本工具”的定性和“文道统一”的要求在历次大纲中得以坚持。历次大纲均把“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作为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并提出了思想教育的要求,强调重视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两个方面。其二,语文“双基教学”的思想得以贯彻和发展。在内容体系上,历次大纲逐步明确地规定了语文知识教学和语文能力训练的内容,特别是1992年的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和1996年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分条列出了能力训练的项目和基础知识项目;在教学序列上,历次语文教学大纲逐步清晰地提出了各年级语文能力训练和知识教学的具体要求,并逐渐修正完善;在教学实施上,历次语文教学大纲要求知识教学联系读写听说实际,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可见,“双基教学”思想在新时期一以贯之,并实现了新发展。其三,强调教学风气,重视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历次语文教学大纲中得以传承。1978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就使用了“下苦功”“严格要求”“扎扎实实地

打好基础”“仔仔细细”“规规矩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提倡启发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措辞,并提出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后来的历次大纲分别作了重申。因此说,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思想要义在新时期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得到了继承发扬。

可以看出,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语文教育历史上的重要坐标,对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如果脱离历史语境,孤立地看待语文教学大纲文本的某些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则可能形成尴尬的历史误会。

四、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当代启示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对当前的语文课程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们应走出对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认识误区,继承其思想精髓,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新时代语文课程教学在正确的道路上实现新的发展和超越。

(一)“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辩证统一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基本工具”的定性并没有否定语文的“人文性”。将语文定性为“基本工具”是为了扭转“教育革命”中语文教学“政治挂帅”的错误。“工具”的定性本身就意味着语文“形式”承载着一定的“内容”,“文道统一”已经充分揭示了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人们所指责的社会上人格异化、价值扭曲的现象,决不是“工具说”的罪过,它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与我国社会急剧转型引发的文化冲突有关。语文课程理应关注人文精神的培养,但必须坚持“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辩证统一。

坚持“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辩证统一,就要深入研究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及其内在机理。当前语文核心素养被分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在语文课程中,学生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都是以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为基础,并在学生个体言语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10](P5)}只有进一步探讨语文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联,特别是进一步探讨“语言建构与运用”与其他三方面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学中“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相互转换和辩证统一。

(二)“语文知识”与“语文运用”的辩证统一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课程“基础知

识”的建构并没有违背语文的“实践性”。提出“双基教学”是为了改变“教育革命”中语文课程内容虚化的现象。“基础知识”教学正是要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在具体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基本训练”的过程进行,“基本训练”的说法已经暗含了语文知识学习的实践性和情境性。后来人们所抨击的语文教学机械僵化的现象,是教学操作层面的问题,与语文教师专业化水平有关,也与教育传统中的弊端有关。语文教学当然应遵循语文的实践特征,但务必坚持“语文知识”与“语文运用”的辩证统一。

当前,坚持“语文知识”与“语文运用”的辩证统一,就要积极推动语文课程内容的重构。语文课程的内容本体就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language),涵盖了索绪尔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文课程的学习,“既包含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11]。建构语文课程的内容体系,要求语文教育者继承“双基教学”的合理因素,积极吸收语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关母体学科为基础,以能有效指导语言文字运用实践为标准进行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转化,构建语文课程的方法性知识体系”^[12]。新的语文课程知识框架既应覆盖“八字宪法”,又应涉及“八字宪法”未全部包含的语形、语义、语用知识。语文知识的教学要通过相应的训练来实现,语文训练,不仅仅指显于外的听说读写(外部言语)能力训练,也包括隐于内的思维(内部言语)能力训练。进一步丰富语文课程知识,才能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中“语文知识”学习与“语文运用”训练的相互促进。

(三)“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辩证统一

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师“严格要求”的强调并没有压制学生的“主体性”。强调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勤学苦练”是为了转变“教育革命”中恶化的教学风气。“严格要求”是教学活动健康开展的根本前提,“勤学苦练”的风气正是教师有效启发、学生有效学习的基本保障,这恰恰体现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统一。后来人们所批评的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既与教学效率低下的现实有关,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优质资源匮乏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语文教学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但必须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辩证统一。

当前,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的辩证统

一,就要正确认识语文教学中师生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学校中的语文课程学习,既包含“习得(acquisition)”,也包含“学得(learning)”。即使学习者的“无意识”习得,教育者也要给予“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可以处在语感的状态中,教师必须处在知识的状态中”^[13]。近些年来,在宣扬“学生主体”的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被严重弱化。对此,有学者提出质问:“在教师完全失语的情况下,学生的主体性是真正被调动起来了,还是被遮蔽了,甚至被歪曲了?从真语文的观念看,这样的主体性是真主体性,还是伪主体性?”^[14]教师的任务就是主导教学活动,把学生自发的、感性的主体提升到自觉的、理性的高度。语文教育研究从西方引入的对话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应纳入语文教学的逻辑中来,用语文教学的规律进行审视和转化。在师生的“对话”“交往”中,双方的人格尊严的“平等”与双方学养的“不平衡”要区别开来。相对具有较高学养的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

责任,应掌握着“对话”的主导权,把握着“交往”的方向和基本路线。用语文教学的规律审视和转化“对话”和“交往”的理论,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师和学生两方面主体性的发挥。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深刻反思“教育革命”错误和深入讨论语文课程教学规律的基础上,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确立了“文道统一”的课程目标,建构了“语文双基”的课程内容体系,强调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体性,为语文教学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的语文课程改革应走出历史的误区,坚持语言本位,深入探讨语文核心素养的内部逻辑,将“语言形式”的教学和“语言内容”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重构语文课程内容特别是方法性知识,将“语文知识”的教学和“语文运用”的训练结合起来;恢复优良学风,特别是强化教师的“严格要求”和学生的“勤学苦练”,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动”结合起来。

注释:

① 本文关于教学大纲的引文全部出自: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1年版。下文不再注明。

参考文献:

-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 [2] 顾黄初,李杏保.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 [3] 洛寒. 反对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J]. 人民教育,1961(8):50—53.
- [4] 顾黄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5] 吴天石. 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J]. 江苏教育,1962(12):3—6.
- [6] 吕叔湘. 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认识[J]. 文字改革,1963(4):1—6.
- [7] 张志公. 张志公自选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8] 周学敏. 改进语文教学的几点体会[J]. 人民教育,1964(3):17

- 21.
- [9] 朱作仁. 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程序的心理学研究[J]. 心理学报,1964(3):266—273. 朱作仁. 小学低年级三种识字测定指标的比较研究[J]. 心理学报,1966(2):118—123.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 [11] 徐林祥. 语言·语文·语文教育[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57—160.
- [12] 靳彤. 从“八字宪法”看语文课程方法性知识的存在[J]. 课程·教材·教法,2016(11):78—84.
- [13] 刘大为. 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与语文教学[J]. 全球教育展望,2003(9):15—20.
- [14] 孙绍振. 真语文拒绝伪主体——兼谈学生主体和教师主导[J]. 语文建设,2015(5):4—8.

A proper approach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 Lei, XU Lin-xiang

(School of Chines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syllabus is formulated for the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in 1963, which is seen as a proper approach to comprehen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ignif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urricular aims. It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Chinese teaching reforms.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ors are expected to learn from the 1963 syllabus an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language form and content, that of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and that of teacher domination and student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syllabus 1963; unity of literature and virtue; two basic principles of teaching; subjec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责任编辑 霍素君]